

# 第一章 “铁门之城”：甲午战争之前的长沙

## 一 绅民“耻闻洋务”心态与城市近代化启动的滞缓

近代中国，风云际会，剧变动荡。在中国的土地上，既有中西方之间的兵战，也有中西方之间的商战，更有中西方之间的学战。凡此三“战”，相互交织，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强烈地冲击着古老中国的自然经济形态和传统文化体系。凡此三“战”，侵略者的西方却又代表了先进与文明——虽然其手段颇为卑劣，但中国只有在经历阵痛之后，才被迫走向开放，走向世界，走向自强之路。

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又决定了中国城市在走向开放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地处内陆的长沙就是一个因绅民意识守旧，开放较晚，而使城市近代化启动受到延缓的城市。当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已借中外贸易之便利，而使城市的结构与功能发生近代转型时，长沙则依旧以“深闭固拒”而闻名。

长沙的“深闭固拒”，源于湘绅的“仇夷”、“拒洋”心态，突出地反映在以长沙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洋教运动中。

长沙第一次反洋教集会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法

国传教士自湘潭来长沙，长沙绅民激于义愤，数千人集于明伦堂，进行口诛笔伐。这次集会的结果之一便是一些鼓动性较强的反洋教檄文的诞生与迅速传播。这些檄文列举了天主教“不敬祖宗”、“男女不分”及“采生折割”等危害，将教士传教同西方各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一起进行批判，号召士农工商“拔剑同仇”，反教拒夷<sup>①</sup>。这些檄文很快被散布到湖南各地和近邻各省，对各地民众反教情绪的滋长，产生了明显的促动作用。例如在江西南昌，士绅“将楚南《公檄》鸠资付梓，一日夜刷印数万张，遍揭省城内外通衢<sup>②</sup>，江西士子“见有《湖南檄文》一纸，一倡百和，攘臂共攻，将天主堂毁折”<sup>③</sup>。这是长沙在近代作为反洋教宣传中心作用的最初体现。

此后，湖南绅民的反教拒洋之风愈演愈烈。同治元年（1862年），湘潭、衡州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在谈判中强烈要求在长沙城内“择取空闲庙宇公所，约地十五亩<sup>④</sup>上下”；“为教中公业”。因长沙绅民强烈反对，清廷未敢贸然应允<sup>⑤</sup>。最后，只得修复（重建）湘潭与衡州两地的教堂，且赔偿教士损失了结。结果，外人的要挟和清政府的软弱妥协，又进一步激发了湘人的仇夷反教情绪<sup>⑥</sup>。光绪二年（1876年）七八月间，湖南士子会集长沙，参加秋闱考试，互传湘省已许通商，西人将至，于是

① 《湖南闾省反洋教公檄》、《抄录天主教十害公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大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册，第220～223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② 夏燮《中西纪事》卷21，台湾文海出版社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以下简称《史料丛刊》）正编106号，第182页。

③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二），第1059页，该所1974年版。

④ 亩：市制面积单位，1亩=666.67平方米。全书同。

⑤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二），第1088页。

⑥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8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群情激愤，争言抵制。长沙城内，很快便“揭帖满街”<sup>①</sup>。例如，其中一份揭帖指出：“自洋夷肆毒，率土罹殃”；“固尽九牛之毛，不足以数其罪”；号召湘人，“洋夷入境，不问有无情弊，立即格杀，毋令遗遁”；“天主教设立教堂，立即约众拆毁”；“湖南各处码头，不准售与洋夷修占，如有勾通情弊，立即格杀”<sup>②</sup>。

长沙绅民的反洋教宣传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其时，寄居长沙的在籍陕西补用道周汉，在长沙三书院学生和一般绅民以及少数官员的支持下，编印、刊刻了大量的反洋教宣传品，包括书本、歌谣、揭帖、檄文、公启等共计 43 种之多<sup>③</sup>。据调查，仅其中的一种名为《鬼叫该死》的小册子就印刷了 80 余万册<sup>④</sup>。周汉利用省城善堂作为发行机构，将这些反教排外宣传品大量传输到各地，同时在省城长沙的大街小巷亦遍张贴、图画，以“毁谤洋人，专污洋教”<sup>⑤</sup>。传播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反教宣传品，对鼓动民众的反教情绪起了较大的作用，使长江流域各省的反洋教事件迅速增多<sup>⑥</sup>。

长沙作为反教宣传中心作用的日益凸现，引起西人的极大恐

①（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 892 页，该所 1975 年版。

② 《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 891 页。

③ 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第 240 页，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另，吕实强先生称为 33 种，见吕实强《周汉反教案》，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 4 编《教案与反西教》，第 494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④ 吕实强《周汉反教案》，《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 4 编，第 526 页。

⑤（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三），第 1360 页，该所 1977 年版。

⑥ 直到几年后，西人依然对湘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所应负的“责任”耿耿于怀。例如英国《泰晤士报》在一则评论中这样说道，“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长江一带连闹教案，湖南人不得辞其咎”。见《英国泰晤士报论中国时下情形》，《时务报》第 55 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史料丛刊》三编 328 号，第 3728 页。

慌。为此，英、美、俄、法、德、荷兰、比利时等国驻汉口领事专门集会商议对策，强烈要求清政府对参与其事者，“不论各种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sup>①</sup>。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则鉴于长沙民情激昂，担心重办会激发事变。因为他得知，长沙三书院学生对周汉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扬言，若周汉获罪，士民即将长沙城内 70 余名教民杀害<sup>②</sup>。为了在洋人面前有所交代，清政府只好将长沙城内曾代为刊刻揭帖的几家书铺封闭，将民间搜集到的各种反教宣传品，由江汉关道会同驻汉口各国领事一起销毁；对周汉则以“身为职官，言语荒诞，迹类疯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造谣煽惑，实属咎无可辞”的罪名，而将其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sup>③</sup>。经此打击，长沙的反教声势虽然有所减弱，但民众的仇夷排外活动实际上一直持续着。直到长沙维新运动兴起之后，长沙绅民对前往游历的洋人，仍然“不免惊疑”<sup>④</sup>，部分绅民仍在传刻揭帖，并拟“约期打洋人”<sup>⑤</sup>。

长沙和湖南各地民众强烈的仇夷反教之风给图谋进入湖南的洋人以有力的阻遏，例如 1887 年一个传教士诉苦说：“就人的力量来说，至少就取得一个居留地而论，现在湖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闭守固拒了。”<sup>⑥</sup> 时人记述，直到 1897 年，洋人尚未进入

①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 1 (1892), P. 164. 引自吕实强前引文，第 498 页。

② 张之洞《致总署》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卷 13，《史料丛刊》正编 464 号，第 9862 页。

③ 《湖南省志》第 1 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 122 页。

④ 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张文襄公全集》卷 153，《史料丛刊》正编 466 号，第 10952 页。

⑤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张文襄公全集》卷 156，《史料丛刊》正编 466 号，第 11210 页。

⑥ 引自（美）周锡瑞《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第 40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长沙<sup>①</sup>。于是恼羞成怒的外国传教士遂将长沙（乃至湖南全省）诬为“铁门之城”，意即一个“拒绝文化洗礼”的地方<sup>②</sup>。

反洋教是湘人仇夷拒外之风的主要表现形式。湘人仇夷反教的心态，首先源于对帝国主义在野蛮武力侵略下的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的愤恨，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坚定的反侵略斗志<sup>③</sup>，这一点和晚清时期各地的反洋教运动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长沙，绅民的反教仇夷思想中，“保卫圣道”的主旨十分突出。这和长沙的城市文化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为了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有必要对长沙、乃至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概略探析。

湖南一省，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自成一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由于古时交通不便，生态环境不良，给湖南同中原文明的交流带来了诸多困难。以与中原关系较为密切的长沙而言，至汉王莽时，尚称“填蛮郡”<sup>④</sup>，处于“半蛮夷”<sup>⑤</sup>状态，说明西汉时尚未得到中原文明的泽惠<sup>⑥</sup>。自东汉始，下迄隋唐，湖南与中原的交流虽有所增进，但从总体上而言，仍“殊鲜进步，故不为蛮夷所嫉视”<sup>⑦</sup>。因湖南地理偏僻，食货两艰，苗蛮所萃，人文少及，故宋代之前一直为流囚、遣客栖息之所。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 300

① 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张文襄公全集》卷 153，《史料丛刊》正编 466 号，第 10952 页；《英国泰晤士报论中国时下情形》，《时务报》第 55 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史料丛刊》三编 328 号，第 3728 页。

② 《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第 38 页。

③ 见《湖南省志》第 1 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 81~84、120~122 页。

④ 《汉书》卷 28，《地理志》第 6 册，总第 1639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⑤ 《汉书》卷 95，《西南夷传》第 11 册，总第 3852 页。

⑥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第 7 页，（台北）近代史研究所 1983 年版。

⑦ 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第 1 卷第 4 期。

年，长沙刘蛻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sup>①</sup>，足见上古湖湘文化的薄弱。在这样一个文化相对贫瘠的区域环境之中，长沙虽然作为一个区域政治中心的功能特征得到了延续，但在文化建树方面却没有大的突破。

但是，到了宋代，湖南同中原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开始明显加强，湖南的区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北宋末年，湖南“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sup>②</sup>。北方人口大量南徙，进入湖南，使湖南“户口之众，数倍前日”<sup>③</sup>。至明清之际，更有“湖广熟，天下足”<sup>④</sup>的民谚，足以说明湖南经济地位之重要。

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兴起。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长沙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因书院办学成效突出，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并赐“岳麓书院”匾额。此后，书院声望日隆，“鼓箬登堂者相继不绝”<sup>⑤</sup>，遂升为潭州“三学”（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中之最高学府，位列北宋书院之首<sup>⑥</sup>。南宋建炎年间，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衡岳，“卒开湖湘之学统”<sup>⑦</sup>。绍兴年间，胡氏弟子、理学大家张栻创建长沙城南书院，并掌教岳麓书院，进一步推动了长沙文教事业的发展，使长沙成为中国古代理

①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5页。

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7，《田赋·屯田》，考78，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③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二之三，第6册，第5009页上，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

④据张国雄先生考证，这一谚语最早出自明人何孟春《余冬序录》，见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

⑤引自朱汉民《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第10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朱汉民《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第11页。

⑦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第3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学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四方学者，争相往之”。乾道三年（1167年）秋，理学大家朱熹不远千里，由闽入湘，与张栻论学。九至十一月，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引起学界轰动。据说，远道前来听课者甚众，书院门前车水马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sup>①</sup>。朱、张会讲，愈益抬高了岳麓书院的声望；“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sup>②</sup>；“岳麓之名遂以闻于天下”<sup>③</sup>。名家学者争相前往，与岳麓诸儒问学论道，一时“潇湘之地，有洙泗之风焉”。元迄明清，岳麓书院虽难免遭兵燹之灾，但均很快得以恢复。其学术影响并未减弱，一直是“振三湖人文，维万代风教”<sup>④</sup>的重要基地。

在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园地的发展历程中，理学始终在书院占据着主导地位。书院历任山长皆“以洛闽正轨陶铸弟子”<sup>⑤</sup>，教诲士子“务以程朱为宗”。清帝康熙和乾隆分别为书院赐额“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就是对该书院理学地位的肯定。到清代乾嘉汉学风行之后，湖湘学派仍“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sup>⑥</sup>（不过，岳麓诸儒并没有将理学与汉学对立起来，而是在坚持以义理之学为本的前提下，肯定理学与汉学的统一<sup>⑦</sup>）。

理学在湖南的坚固地位，和湖南的区域文化发展特点有关系。宋代之前的湖南，文化基础薄弱，宋代理学产生之后，湖南

① 康熙《新修岳麓书院志》卷3，另见龙骧《重修岳麓书院记》，《湖南文征》卷47，同治十年湘潭罗氏刊本。

② （元）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岳麓文钞》卷3。

③ （明）陈凤梧《岳麓书院原序》，《岳麓文钞》卷4。

④ 皮锡瑞《岳麓书院六君子序赞》，《师伏堂丛书》第36册，第16页，光绪甲辰年冬月刊本。

⑤ 李翰章编纂《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4，《史料丛刊》续编4号，第12938页。

⑥ 罗汝怀《绿绮草堂文集》卷首，《行状》，光绪九年湘潭罗氏刊本。

⑦ 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第212~213页。

一跃而为“理学之邦”，长沙成为湖湘理学传播的中心。先前的文化自卑感骤变为一种学术荣誉感，使得湖湘士人对理学十分珍视。尤其是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在岳麓书院的“遗泽”，更成为书院重要的精神资源，成为湘人持续传承的“道德偶像”，抑或是“先贤形象资本”<sup>①</sup>。故此，湘人多奉理学为“正学”，甚至有人称，理学“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sup>②</sup>；湖南道学一时为天下宗，书院之兴，于斯为盛，自理学大著，渊源不绝，先圣之道，赖以不坠”<sup>③</sup>。官僚、士大夫亦多以理学之道劝勉、激励湖南士子，使理学思想不仅作为学术思想受到士大夫的崇奉，而且渗透到了日用伦常和社会习俗中。

岳麓书院以理学为宗的学术传统，对近代早期大批湖湘理学经世人物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等都在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理学根基，他们出仕理政之后，则成为理学的卫道士，严守封建纲常伦理。如刘蓉的座右铭是：“仁义理智之德，无须臾之敢离；日用伦常之理，无毫发之敢差。”<sup>④</sup>曾国藩则称：“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sup>⑤</sup>

这种理学传统也促进了一般绅民尚理卫道信念的确立。而这一信念在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太平军起义爆发后，曾国藩会同湖湘士绅编练湘军，招募

①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3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宋）真德秀《劝学文》，《真西山文集》卷40，《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13号，第1174册，第617页；另见《真文忠公全集》第7册，第3960页，台湾文友书店1974年版。

③李棠《益阳龙洲书院志序》，《湖南文征》卷28，同治十年湘潭罗氏刊本。

④刘蓉《罗子畏字说》，《养晦堂文集》卷1，《史料丛刊》正编382号，第23页。

⑤曾国藩《喻纪泽》，《曾文正公全集》家训下，《史料丛刊》续编9号，第20459页。



“老实朴拙”之农民，以维护纲常伦理相号召，打起了“保卫圣道”的大旗。湘军动员文告《讨粤匪檄》这样说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主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sup>①</sup>可见，在湘籍官绅看来，针对太平军的作战，不仅仅是对叛乱者的镇压，更主要是一场捍卫夷夏大防，维护名教圣统的文化保卫战。历经十余年的战斗，以理学思想武装的湘军终于将雄踞金陵的“异教徒”剿灭，不仅挽救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完成了保卫名教圣道的“光荣使命”，进一步确立了湖南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忠义之邦”<sup>②</sup>形象。经此一役，湘军走向全国<sup>③</sup>，湘军将领成为晚清政坛一支重要力量<sup>④</sup>，湘人名声大振，使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

①《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史料丛刊》续编4号，第12685~12686页。

②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3，学校10，考8617，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如王定安称，湘军“用兵遍十八省”（《湘军记》卷1，第2页，台湾文苑出版社1964年版）；王闿运称，“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无他，专灭洪寇之功耳”（《湘军志》总第2页，台湾文苑出版社1964年版）。

④湘军将领官至督抚者计27人，见罗尔纲《湘军兵志》第56~65页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

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sup>①</sup>的局面。

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又进一步助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鄙夷西教的社会观念场。而“观念模型一旦形成，就成为某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对人们的思维过程起到指导、定向的作用，制约着人们的思维线路和思维结果’<sup>②</sup>。近代湘人炽热的反教拒外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自命不凡的卫道使命感在作祟。例如《湖南闾省公檄》列举天主教的“切肤之害”主要是：“不扫墓庐，不祀本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妹，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天主教十害公檄》则说：“吁！耶稣之说流行，孔圣之道不作，尚复成何世界！”<sup>③</sup>《湖南士民公传揭帖》更开宗明义地说道：“我湖湘士民，情溺纲常，俗拘廉耻，食毛贱土，久承北阙之恩，肄礼读书，只识东山之教。假令华夷杂处，哪堪鸟兽同群。”<sup>④</sup>周汉则更是自称为“周孔徒”，表示“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sup>⑤</sup>。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作到了这一点<sup>⑥</sup>。天主教早在明代就进入湖南，清康熙年间传入长沙<sup>⑦</sup>，而湘人“三百年不骇诧以为奇”<sup>⑧</sup>，并没有掀起特别的反教运动。

① 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② 曾杰等《社会思维学》，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大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册，第220、223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④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891页，该所1975年版。

⑤ 杨世骥《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第56页。

⑥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22页注③。

⑦ 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第691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⑧ 谭嗣同语，引自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第65页。

但时至近代，湘人却成了仇夷反教的“急先锋”。除了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日益亟迫的民族危机的激发之外，湘军镇压太平军之后湘人自负心态的滋长是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近代湘人仇夷反教情绪尤烈的缘由，梁启超曾说过：“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sup>①</sup> 其言有一定道理。

湘人以翼教卫道为信念支柱的仇夷反教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情愫的体现。文化民族主义本为近代国人在西潮冲击初期产生的一种必然心态，实属时势使然。然而，对湘人来说，这一心态在其高度的卫道使命感与强烈的自负感支配下，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sup>②</sup> 和强悍民风<sup>③</sup> 的氛围中，则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使湘人由仇夷反教发展至“耻闻洋务”<sup>④</sup>。正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后来所评价的：“咸丰以来……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视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忤，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sup>⑤</sup> 这种“耻闻洋务”的心态严重阻塞了湘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洋务事业在长沙，乃至湖南的推广。这从他们对待轮船、尤其是对待郭嵩焘出使西国及其所著《使西纪程》的表现方面，就可得到说明。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第129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 有人称湖南为“四塞之国”，且境内“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以故风气锢塞而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1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 关于湘人强悍性格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第1卷第4期，1993年6月；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史学年报》第2卷第4期；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张朋园《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辑。

④ 《读湘报》，《申报》1898年7月20日。

⑤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5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43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曾国藩病歿金陵，其灵柩由新式轮船“威靖”号运返故乡。船抵长沙，绅民起而大哗，历数年不息<sup>①</sup>。

光绪二年（1876年）初，寓居长沙多年的郭嵩焘<sup>②</sup>，因“素讲洋务”，思想较为开放，再次被朝廷起用，为处理“马嘉理案”的善后问题而出使英国。此举在京师和长沙均引起了舆论大哗。长沙部分绅民特为郭嵩焘编了一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sup>③</sup>，以表示他们的惋惜与不满。还有不少人甚至指斥郭嵩焘出使为“勾通洋人”之举，并将其名字及“罪状”书于揭帖，“张之通衢”<sup>④</sup>。本年秋闱考试期间，数千儒生汇集长沙，郭嵩焘的“罪状”仍然是议论的中心话题。有人传言，在郭嵩焘的“勾引”下，洋人将至，湖南开埠在即。于是“义愤至极”的儒生们便在少数士绅的组织下，齐集省署公堂前请愿，要求湖南巡抚王文韶设法禁阻<sup>⑤</sup>。他们“情词迫切，大都为愤激之辞，甚至有痛哭流涕者”<sup>⑥</sup>。湘抚不得不好言开导，以“勿轻信浮言”相劝。但是，

①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第56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465页，（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29号，1971年版；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第100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号筠仙，道光进士，曾任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等职，同治六年七月被黜，同治九年正月移居长沙，掌教城南书院（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451页）。

③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第5册，第6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印本。

④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五日，第3册，第8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 王文韶《王文韶日记》光绪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册，第39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⑥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893页，该所1975年版。

愤怒的儒生们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湖南机器局<sup>①</sup>，认为机器局“需用洋人”；实招引洋夷入境之渐，要求“一律严禁”<sup>②</sup>。湘抚告以“仿用机器制造枪炮，正为预不虞起见，且并不雇用洋人”<sup>③</sup>。然而，聚集起来的儒生竟意欲摧毁机器局，方肯罢休，但又不得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清楚“机器局（系）奏请设立，不宜毁”<sup>④</sup>。为发泄愤懑情绪，儒生们一举焚毁了由郭嵩焘创修的长沙四大丛林之一的上林寺<sup>⑤</sup>，以“一泄其毒”<sup>⑥</sup>，并扬言欲毁郭嵩焘住宅<sup>⑦</sup>。这就是近代早期发生在长沙的以反“洋务”为宗旨的

①湖南机器局是湘抚王文韶于光绪元年五月奏准创办的，为长沙最早的机器工厂。该局主要任务是仿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等原材料主要来自湖南。据王文韶向朝廷汇报，该局所造“后门炮及开花炮子等项，演试均能如法，与从前购自外洋者并无区别”；所产火药，“以之试放后门炮，其出子之远近及攻坚之力量正复相同”。王文韶还乐观地宣称，该局“以后随时添制车具，自数千斤以至万斤大炮，或钢或铜，均可自造”，“但就湖南而论，即此小小结构，将来设有军务，无须再向洋人求购军火矣”（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四），第333～3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但是，由于得不到清政府在经费上的支持，该局开办没多久，便因资金枯竭而告停闭。

②（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891页。

③《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892页。

④《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第3册，第855页。

⑤上林寺与泐潭寺、岳麓寺、开福寺并为长沙四大丛林，而独上林寺为法门丛林，见《郭嵩焘日记》第4册，第3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第3册，第855页。

⑦朱克敬《儒林琐记、雨窗消息录》第113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第345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第358页。

## 上林寺事件<sup>①</sup>

上林寺事件亦可以算作晚清时期发生在长沙的一场有影响的学生运动，参与者以秋闱考生为主体，特别以长沙三书院的学生为多<sup>②</sup>。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则是和长沙守旧士绅的怂恿、组织，以及地方官员的昏庸分不开的。对郭的出使之行，长沙士绅目为耻辱，到处“传骂”，甚至表示“湖南人至耻与为伍”<sup>③</sup>。而儒生的行动又主要是针对郭嵩焘与有关洋务事业，自然得到守旧士绅的支持。事发之际，就连平素与郭嵩焘过从甚密的王闿运也未能出面制止。据王闿运当天的日记称，他得知学生议毁上林寺及郭嵩焘住宅的消息后，“亟往樾岑（候补道裴荫森）处，欲令会同府县营兵严行禁止。至则邹叟（孔诤）在，力言必激变，事不干己，遂不复言”<sup>④</sup>。据郭嵩焘后来调查，在这次事件中鼓动最力的就是曾以“天下第一伤心人”名义创作反洋教作品《辟邪纪实》的湘绅崔暕<sup>⑤</sup>，他“欲怙众人狂逞之力”，以进一步扩大长沙仇夷排外的声势<sup>⑥</sup>。另一名绅士黄乾也“奋身倡众”，“喜滋

①关于这一事件，《湘绮府君年谱》是这样记述的：“（光绪二年）八月，湖南乡试时，郭侍郎筠仙出使英吉利，作《使西纪程》，颇言英法制修明，而非中国所能及。时湖南风气闭塞，尤恶洋人，伪言上林寺居有洋人来乡传教，乡试诸生恶之，约会玉泉山，议毁上林寺及郭氏室。”（王代功述《湘绮府君年谱》，《史料丛刊》正编 596 号，第 81 页）此处有误，上林寺事件发生于八月十八日，有湘抚王文韶的日记可以作证（《王文韶日记》上册，第 398 页），而郭嵩焘之《使西纪程》自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始作（《郭嵩焘日记》第 3 册，第 106 页），故不相及也。

②《郭嵩焘日记》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第 3 册，第 60 页。

③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第 5 册，第 6 页。

④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八月十七日，第 5 册，第 38 页。

⑤见《湖南省志》第 1 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 82～83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⑥《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第 3 册，第 855 页。

生事端’<sup>①</sup>；水师营哨官魏国治（号云帆）鼓噪尤力”；此外则巡防营哨官杨作霖（梅村）、卜者黄云甫，并多所附会，造作谣言’<sup>②</sup>；就连与郭嵩焘交谊二十余年的焦萼庄“亦相与喧噪”<sup>③</sup>。可见，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长沙官绅并非个别人。

对于生员和部分官绅的滋事行为，郭嵩焘颇怨湘抚王文韶镇压不力，他在日记中追述道，“王夔石以上林寺由我创修，闻其毁，大喜，急据之以为士气，从而嘉奖之，又令首府出示揭寺僧西枝之罪，驱逐拿办，为之扬其波，而于毁庙滋事乘机纵掠之士民，一置不问，自是而民气之坏乃益不可支”<sup>④</sup>；王夔石之酿祸湖南，为罪甚巨，以致纵容一二滋事之秀才，加之存护，以取悦宵小之口，窃取流俗无知之誉，而自矜其智能，殆亦天地鬼神所必不容者矣’<sup>⑤</sup>。可见，郭嵩焘对王文韶没有严厉镇压滋事者一直非常不满。但事发当天王文韶的日记则作如是记录：“地痞向上林寺滋闹，派兵弹压始散，非访拿严办数人不足以儆刁风也，可恨！可恨！”<sup>⑥</sup>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喜”的味道。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至少不希望自己的辖境出现乱事（此事后来惊动了朝廷，恭亲王奕訢亲自追查<sup>⑦</sup>），所以说王文韶有意鼓动学生滋事，实为郭嵩焘的自我揣度。但另一方面，王文韶面对长沙乃至湖南强大的绅权势力与强悍刁顽的民风，又不敢过分严厉对待，亦属实情。这从他在事件发生后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可以看出：“湘中民情势悍，人心团结，充其百折不回之气，足以众志成城，不

① 《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三月廿四日，第4册，第3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十二日，第3册，第897页。

③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九月十二日，第3册，第937页。

④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第3册，第855页。

⑤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八月初九日，第3册，第924页。

⑥ 《王文韶日记》光绪二年八月十八日，上册，第39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⑦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九月三十日，第5册，第46页。

畏艰险。遇拂其情，则其变动亦竟不可思议。……文韶惟有随机化导，固不敢任其嚣张，致后弊端。亦不敢操切从事，转滋腾沸也。<sup>①</sup>说明王文韶是有所顾虑的。对王文韶的软弱态度，王闿运亦觉不妥，他在日记中这样埋怨道：“王抚畏势而不敢言其非，礼纪安在乎？此事王抚当捕乱民，筠仙（郭嵩焘）宜置不论。”<sup>②</sup>

王文韶的软弱与妥协亦是长沙官绅势力长期对抗的结果。自湘军兴起之后，湖南绅权大张，使官绅在社会控制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大。而在这些对抗中，又多以官权的妥协与退让为结局。例如，曾任湖南布政使的蜀人李榕就因不为湘绅所容，遭弹劾而被革职；湘抚毛鸿宾曾“恶绅与官事，谋至去之”，后遭到湘绅的联合反击，毛“乃大窘”，遂不得不“诣诸绅谢，任以事，又礼加焉”<sup>③</sup>；王文韶出抚湖南后，虽心存“屈抑士绅”之意<sup>④</sup>，且“有孜孜”<sup>⑤</sup>，但终究不敢采取强硬的对策，在湘绅面前，王文韶“遇有强狠负固者则憚之，人众则憚之，挟端求逞者则憚之”<sup>⑥</sup>。可见，官权试图屈抑绅权的结果却是官权自身受到“屈抑”。这一局面在此后较长时间内一直未有大的改变。例如，湘抚卞宝第对湘绅不得不“颇相款接”<sup>⑦</sup>。直到甲午战后长沙举办各项新政时，“凡筹款公事，大率系地方官邀集正绅共同筹议”<sup>⑧</sup>。

官权的旁落，使长沙乃至湖南的非官方势力和非官方意志得

①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893页。

②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九月三十日，第5册，第46页。

③ 朱克敬《儒林琐记、雨窗消息录》，第114～115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④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廿三日、七月初九日，第3册，第903、911页。

⑤ 《郭嵩焘日记》光绪七年二月十九日，第4册，第146页。

⑥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廿三日，第3册，第903页。

⑦ 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第947页。

⑧ 张之洞《湘路商办窒碍难行应定为官督商办并举总理协理折》，《张文襄公全集》卷68，《史料丛刊》正编459号，第4642页。



到相对充分的展现，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保守绅民的声势。时人易梯衢曾有如是评论：“楚人于洋务全无知晓，其原因在官者漫无考究，不能剖切宣示，以至相与惘惘，捕风捉影，迷离情况，猖狂恣睢，无所辨知其得失。”<sup>①</sup>此话实际上只说对一半。何以见之？彼言楚人不知洋务的责任在官员之昏庸，官员昏庸可能不假，但湘人“耻闻洋务”之风如此强盛，而且绅权强大，民风悍顽，绅民甚至敢直标督抚之名，“指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国典王章，悍无所顾”<sup>②</sup>，即使是奏准设立的机器局亦差点毁于守旧绅民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官员想“宣示”洋务，又如何着手呢？

长沙守旧绅民拒绝“开眼看世界”，顽固抗拒洋务的思想还可以从他们对待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及对待回国后的郭嵩焘本人的态度上得到显现。

郭嵩焘出使启程之际，经总理衙门奏请，清廷诏令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录，随时咨报，以便数年之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即办理一切，似不至漫无把握”<sup>③</sup>。根据这一旨意，郭嵩焘将自己在从香港至伦敦沿途二十多个城市的所见所闻进行了详实记录，并结集成《使西纪程》一书（又名《英轺纪程》），向国人如实汇报了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意在开拓国人的视野，激发其开放自强精神。他的日记经总理衙门刊发后，在京师和长沙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廷臣对其“极意夸饰”英国多有不满，甚至还有人以“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的罪名弹劾他<sup>④</sup>。在长沙，绅民对《使西纪程》大

①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三月廿八日，第3册，第859页。

②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五日，第3册，第854页。

③ 《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18，遣使，第8页，《史料丛刊》三编134号，第1621页。

④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二日，第6册，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